

你心中的玫瑰花蕾何时绽放

刘晓莹

作家阿城说，以前，亚洲人到了牛奶多的地方，绝大多数都会出现喝牛奶即泻肚的问题，这是因为亚洲人小时候牛奶喝得少或根本没得喝，因此缺乏某种蛋白酶而造成的，所以，他主张，人要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吃各种食物，以使蛋白酶的形**成**尽可能完整。饮食习惯会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他还认为，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

有人说，人由童年到老年，就像蝉一样，总要经过几次蜕变，不断地换壳长大。然而，文化的“蛋白酶”往往形成于人生的早期，经历再多次的换壳、蜕变，也摆脱不了“蛋白酶”的控制。换句话说，不管青年、壮年时期，是否曾千山万水走遍亦百般滋味尝过，但来自文化母体的基因、童年时期形成的口味始终蛰伏在体内，时不时地冒头，提醒人们幼时刻下的印记。因此，阿城在异国时，总是在旅行中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也因此，曾到西方求学、去国日久的傅聪到了晚年，会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高山大海那么深厚，给予我很多养料。”

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和误解，或许也可以用文化里的“蛋白酶”来解释。杨绛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童年听到的故事，“洋鬼子”吃铁蚕豆，吃了壳，吐了豆，摇头说：“肉薄、核大，有什么好？”煮茶，沏去茶水吃茶叶，皱眉道：“涩而无味，有什么好？”这是最表层的因缺少文化“蛋白酶”而导致误解的情形，而电影《推手》《刮痧》的故事，则反映了较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当然，现实中还有一些真实的活生生的例子，从生活习惯到对权利、自由的理解，分歧比比皆是，屡屡让人产生一种鸡同鸭讲的无力感。

被称为“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的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似乎是拥有完美文化“蛋白酶”的人。他童年时期生活在苏州，狮子林是他家祖上的私家园林，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他接受的是西方建筑设计教育，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相互映照，和谐共生。因此，他既有方浮宫玻璃金字塔等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佳作，也有诸如苏州博物馆这样呈现丰富中国元素和浓郁东方审美的经典。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近40年的中国探亲观光，心中无限感慨。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不管到哪里生活，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在美国吃不上苏帮菜的淡淡乡愁，只是文化“蛋白酶”给他带来的些微遗憾。

好莱坞的两部老电影曾经有过类似文化“蛋白酶”的思考表达，一部是《公民凯恩》，另一部是《党同伐异》。《公民凯恩》的主人公凯恩一生得到的毁誉不一，有人称他是“爱国者”“民主主义者”，也有人骂其是“战争贩子”“叛徒”。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搅动风云的报业大亨，在临终之时喃喃惦记的却只有一个让人诧异的词——“玫瑰花蕾”。在记者深入调查了凯恩的一生后，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字眼可以概括凯恩的一生”，然而，当影片末尾写有“玫瑰花蕾”字样的儿童雪橇板燃烧起来的时候，观众才恍然，原来再了不起的人物、再耀眼的人生，难忘的却不过是童年时单纯的快乐，人生的“蛋白酶”隐藏在童年的久远中。

人生的轨迹大概就是一条抛物线，青壮年时总是充满对陌生领域和新鲜事物的向往，有着向外的张力，但再大的张力，似乎也敌不过地心引力，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究会向出发时的水平线回归。而人生中充当“地心引力”的，大约应是文化的“蛋白酶”。

《党同伐异》是一部在商业上惨遭滑铁卢的巨片，但同时也是**一部**主题严肃、艺术上具有先锋特质的佳作。电影以一个母亲推摇篮的镜头开始，插入惠特曼的诗句：“如今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忧乐悲欢。”影片讲述了发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四个故事：“巴比伦的陷落”“基督受难”“圣巴泰勒米节的屠杀”和反映20世纪初美国劳资冲突的“母与法”。四个平行发展的故事中，前面三个都是因为缺乏爱与宽容而走向杀戮的悲剧，而唯有最后一个因真心良心的发现，“最后一分钟营救”而避免了类似的结局。因此，影片的末尾，画面仍回到母亲和摇篮那一幕静穆的画面。如果影片导演大卫·格里菲斯认同文化“蛋白酶”这一说法的话，则他在这部影片里给不同文化共同的“蛋白酶”的定义，应该是“爱与宽容”。

叔本华认为，“欧洲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与亚洲人截然不同”，而钱钟书先生则在读尽世间该读的书成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后断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或许，我们无法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相通、相融的可能性。而爱与宽容，理应是文化的“蛋白酶”中最主要、最有益的成分。爱与宽容，正是我们心中的玫瑰花蕾。



贝聿铭设计作品：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影评

《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无可争议的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之一，并被多次改编成电影，2022年再度被翻拍上映，足见作品之精彩和经典。虽然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票房有点“惨”，但笔者观赏之后，仍感觉其不愧是悬疑侦探片的鼻祖之作。

1. 资产阶级家族富家女林内特与闪婚丈夫西蒙举行着华浪漫的新婚旅行，受邀参加的有林内特的管家表哥、前男友、教母及其女仆、爱情见证人等亲友，还有阴魂不散的西蒙前女友杰奎琳。豪华游轮加上美酒、鱼子酱，还有美不胜收的壮阔美景，使旅行看上去气氛热烈，和乐融融，但实际上暗藏杀机。

杰奎琳因林内特横刀夺爱而对她恨之入骨，誓死要夺回自己的爱人；被委以重托的表哥贪污家族巨额资产，因担心罪行败露而怀揣一把手枪；教母女仆的真实身份是教母的女友，曾经富有却惨遭林内特父亲收购破产；林内特前男友依然爱着林内特，却被邀请亲眼目睹林内特与他人步入婚姻殿堂；作为爱情见证人的酒吧主唱因早年遭受林内特父亲的种族歧视而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也把一把袖珍手枪藏在帽子里……表面上送上热情祝福的各方亲友们，居然个个都潜藏着嫉恨或仇怨，个个都可能怀有杀人动机。

林内特感觉到了四周的杀机重重，并在最后一个夜晚于睡梦中被枪杀，这完全在观众的意料之中，但究竟谁是凶手呢？好在**大**侦探波洛洞穿了每个人的内心，没有被表象所迷惑，拨开层层迷雾，通过丰富的破案经验查找到了被抛弃的作案工具，又通过抽丝剥茧的询问与心理分析，揪出了精心策划布局的杀人真凶及其帮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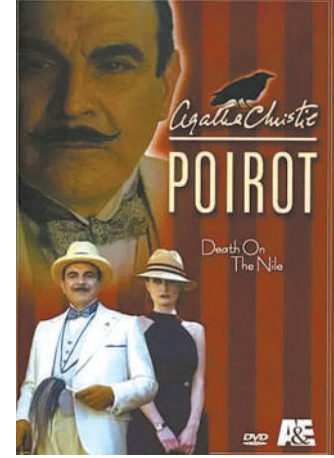
笔者作为从检近三十年的检察官，观影中潜意识里一直感觉那些对林内特怀有杀人动机的亲友必定不会是真凶，而真凶肯定是林内特完全意想不到、完全不会防备，同时也是观众难以预测的那个人，隐约之中有自己的怀疑对象，但直到波洛揭开真相时，我才对真凶的杀人动机恍然大悟，佩服作者精妙绝伦的构思设计。

在笔者看来，这部经典影片不仅满足了观众悬疑的娱乐心理，更具有司法现实意义。我国历年来的冤错案，不少就是因为错误认定杀人动机而主观轻信“锁定”嫌疑人。比如杜培武案，杜培武妻子与另一名男性一同死在面包车内，侦查方认为杜培武具有怀疑妻子出轨而报复杀人的动机；再如念斌案，念斌与隔壁邻居有生意竞争关系，因此有人认为念斌因顾客被邻居招揽过去

史评

东方强大藩王借诊治疾病而不得为由，迁怒淳于意及其靠山刘将闾，行诬告陷害之事，文帝心知肚明，因此通过此案敲山震虎，在废除肉刑这一行政的外衣包裹下，断绝了地方藩王此后不行王法而滋事滥权的念想。

西汉文帝废肉刑改革的动因乃是感动于缙索上书救父的行动。淳于意乃当时名臣，早年间为了精进医术和摆脱贫困，选择了自由且愉悦的游士生活，在拜师问药和诊治实践的过程中，他一直在选择合适的依附对象，最后成为杨虚侯刘将闾（后为齐王、齐孝王）的门客。门客不仅易受主人牵连，而且会被争抢挟制。没过多久，淳于意得到刘将闾的举荐，在他的故里齐文王刘则的官廷之中谋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太仓长。淳于意上任后极力做廉平之官，然禁不住为人治病的“诱惑”，不经意间便会显露医术，遭到了御医群体的抵制。不仅如此，因声名在外，作为稀缺的高级医疗资源的淳于意还引来了诸多东方藩王的轮番争抢，他们先后以征召的名义向淳于意发出邀请。在洞悉当时天地关系和政治时局，以及各藩王的品性后，淳于意担心被扣留而不敢前往应召治病。这些藩王们因此怀恨在心，将怒火发泄到淳于意及



而对邻居心生杀机；再如张玉环案，两名受害儿童曾把张玉环家厨房的盐和酱油倒进水缸里，据此推测认为张玉环具有作案动机，而为了验证这种主观判断，不惜采取各种“非常”手段，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从而宣告“破案”。这些草率认定犯罪动机的案件，最终都未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若干年后或被证实系冤错案，或被法院以疑罪从无原则宣判无罪，值得我们总结反思。

2. 这部影片告诉人们，犯罪动机或许人人都有，每个人人生中都可能遭受过各种各样的歧视、冷落、不公平、屈辱、苛责、诽谤甚至伤害，由此产生的怨恨、愤懑、寒心、痛苦、失望等情绪都可能转化为犯罪动机，但又可

熊红文

尼罗河上的惨案

从上至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年版、1978年版、2004年版

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情绪上，隐忍着或者忍气吞声，又或者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化解。是否转化为犯罪动机，因人而异，而且是因人而大异。

有的人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没有产生对肇事人或害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深仇大恨，而是给予宽恕和谅解；而有的人则因为遭受他人不经意间的一点侮辱或伤害甚至因为生活中的一点琐事冲突，就心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杀人动机。所以，侦查人员应该认识到，被害人生前可能与很多人有过过节，或者遭受过很多人的嫉恨或仇视，但绝不意味着那些被害人得罪过的人或被害**人**嫉恨仇视的人就是**有**犯罪动机的人。一个人是否有犯罪动机，其实只有这个人自己清楚，我们不能以一般人的观念甚至以自己个人的观念标准去衡量和推测，进而强加给他人，给他人扣上“犯罪动机”的帽子。而即便是真的产生了犯罪动机，在刑法上也只能认定为具有犯罪思想，即潜在的犯罪欲念，并不一定会付诸行动。

仅仅有犯罪思想是不构成犯罪的，是不能追究任何法律责任的，行为人至少是实施了为实现犯罪动机而创造机会、准备工具等实质性行为也即犯罪预备行为，才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换言之，一个人内心深处是否有犯罪思想以及有什么样的犯罪思想，我们在缺乏行为真实证据的前提下，是不需要也无权去查究的。

影片中的大侦探波洛显然深谙侦破之道，所以他没有因为船上的哪一个人对林内特心怀嫉恨或仇视就草率地认定此人有杀人动机，也没有因为哪一个人杀人杀人动机就死咬住他不放，从而将此人列为自己唯一的**侦**探对象，而是从查找杀

人凶器和丢失的围巾、色料等客观证据入手，找出了最容易被忽视的真凶。真凶现身之时，船上的各色人等才恍然发现，他们心中的那点恶念根本就不算什么，毕竟他们还用道德和理智克制住了自己，而眼前这位真凶——林内特和他无冤无仇，且托付了全部的身心并给予了充分信任，他却狠毒地将林内特杀害，还将这些与林内特有着各种爱恨情仇的亲友拉上船，利用他们或隐或现的杀人动机作为自己杀人的烟幕弹，试图迷惑波洛的侦探视线。所有围绕**着**林内特的那些嫉恨之人组成的迷雾，可能让真凶逃之夭夭。

司法实践中，我们在侦查杀人案件时总是习惯先从排查犯罪动机入手，总是认为找到了犯罪动机就锁定了嫌疑人，再通过逼取口供以获取其他证据。其实这种侦查思路是很危险的，必须谨慎对之。因为犯罪动机潜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可能与被害人情同手足又或仅有一面之交的某个人内心却深藏着某种恶念甚至杀人动机，而这种动机并不外露甚至丝毫不被察觉，相反，与被害人有着明显过节或仇怨的人反而可能没有杀人动机，并且，这种过节或仇怨越是为人所共知，此人杀人的可能性反而越小。有时候，凶残的动机可能潜藏在外人**所**不及、不熟悉之处。

如果仅仅以有杀人动机就有杀人重大嫌疑的思维定势办案，逮住一个有杀人动机的人就咬住不放，进而滥用侦查手段去“验证”自己的推测判断，那么真凶就真的要躲在一旁匿笑了。所以，侦查人员应该转换侦查思维，抛开惯性思维，不要轻易肯定某人有犯罪动机而将其锁定为唯一的嫌疑人，也不要轻易否定某人**有**犯罪动机而将其排除在侦查视线之外，从侦查之初就应重视对各种物证、书证、音视频、电子证据、痕迹、气味等客观证据的查找，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以防时过境迁而错失取证良机。在获得客观证据后，再反过来根据客观证据倒查谁才是真正有杀人动机者，这种由客观到主观的侦查取证思路才是科学合理、准确可靠的。

3. 影片对于检察官审查起诉案件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告诫检察官审查案件要先从客观证据入手，客观证据才是检察官办案最可靠、最值得信任的参考。检察官要提升自身鉴识客观证据尤其是**对**技术性鉴定、勘验、检验、检测等专家意见的辨别能力水平，运用智慧检务让客观证据“说话”，查明案件事实，再转而审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最后再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这种审查案件思维

模式才是符合司法规律，最可能实现客观公正的。

同时，检察官一定要以审慎的眼光看待证人证言，不要认为某个证人表面上与案件无涉就天然地、全盘地忽略其证言，要知道任何一个证人都可能与案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其内心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甚至罪恶，而这就必然使证人作证的内心变得不再纯净，其证言真实度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纯属谎言。影片中的布克就是这样一位证人，他原本是与林内特没有任何情感和利益瓜葛的局外人，也由此深得波洛信任，却未曾想因为一念之差卷入案件，被裹挟着帮助真凶掩盖杀人犯罪。幸亏波洛通过布克丢失的红色外套识破了他的谎言。

没有任何一个证人的证言是绝对、天然可靠的，对每一个证人的每一份证言都要审慎、细致地审查，通过审查证人出证的内外外部环境、与案件的关联，证言与其他证据的印证或矛盾等作综合判断，这样才能确保审查结论的客观公正，不让真凶漏网，更不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甚至被错杀。



“纵观世界侦探文学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如果说有谁已经超越了这一类型文学的类型化束缚，恐怕我们只能想起两个名字——一个是虚构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而另一个便是真实的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她个人独特的魅力创造着侦探文学史上无数的传奇。”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生涯持续了50余年，总共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她的作品畅销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量已经突破20亿册。她创造的小胡子侦探波洛和老处女侦探马普尔小姐为读者津津乐道。她是“柯南·道尔之后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是侦探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

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依然是世界侦探文学宝库中最宝贵的财富。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舞台剧《捕鼠器》，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演场次最多的剧目；而在影视改编方面，《东方快车谋杀案》为英格丽·褒曼斩获奥斯卡奖，《尼罗河上的惨案》更是成为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任待医之位。案结三年之后，文帝专门诏问淳于意，其用意，一是为了解享受废除肉刑“利好”的第一人是否为欲改过自新的人树立了榜样。文帝当时已了解到其废除肉刑造成了“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后果，故而选择诏问淳于意来回应对改革刑制的批评。二是为了看看将淳于意这一极度稀缺的医疗资源专门放在齐王身边，是否发挥了作用。文帝将淳于意为巩固汉廷与齐国关系的牢固纽带，以此震慑其他欲挑战中央的地方诸侯。三是为了单纯检验淳于意的医术，同样追求长生不老的文帝需要看看淳于意**是否有**实现自己成仙得道的本事。所有这些信息均可从淳于意答诏文帝的25例诊籍中挖掘出来。此后，淳于意父子似乎被史家刻意隐去，消失得毫无踪影，颇让人生疑。

文帝肉刑改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标志事件，是因为该事件首先应该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标志事件。缙索救父的成功只因其父淳于意所涉并非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牵涉到皇族内部争斗的政治事件。文帝需要在军功集团和亲贵集团之间进行精细博弈，不仅需要利用淳于意父子这样的特殊人物作为导火索，更需要利用齐孝王刘将闾和赵吴等东方藩王的互相牵制，才能开启废肉刑等重大政治改革。